



# 为什么要重视县乡孩子们的教育

□ 齐燕

县乡的孩子们为谁而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县乡孩子们的教育。

在中国，县乡的孩子们能否相对低成本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获得大学教育机会，不仅关乎县乡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否成功、阶层流动能否实现，还关乎国家的整体流动渠道能否畅通，关乎国家对县乡教育的巨额投入能否实现预期培养效果，关乎能否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

## 县乡孩子们与县乡家庭

教育在政府和社会大众的视野里，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作为民生问题被重视和讨论。教育是县乡家庭最重要的支出项目之一，教育结果也会影响县乡家庭的发展状态。

然而，对于县乡家庭来说，由于其经济积累能力有限，且家庭面临着很强的城镇化压力，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力远远无法和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及富裕家庭相比。县乡家庭需要低成本且质量不错的教育服务。

低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低成本；二是校外教育的低投入，通过提升校内教育质量，减少家庭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要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就需要我们办好办强公办教育，让公办学校成为家庭认可的优质教育资源。

如果我们的县乡教育出了问题，出现乡村教育衰落、县中塌陷、公办教育衰落等现象，无法满足县乡家庭期待的低成本且质量不错的教育服务，县乡家庭就会被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记者 郭韶明

想要准确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以下简称“埃尔诺”）代表作《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男”和“女”，“位置”“故事”和“记忆”，几个词语仿佛若暑假作业中的连线题，一不小心就匹配错了对象。

最近埃尔诺的“一个”宇宙中，又添一员“大将”——《另一个女孩》。这本小说写于2010年，中文版权日前首次引进中国，由傅雷翻译奖、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得主胡小跃担任翻译。

如果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写的是父亲，《一个女人的故事》写的是母亲，《一个女孩的记忆》写的是埃尔诺自己，那么这次，她则将笔触聚焦于一个特殊的人物：在“我”出生之前就己经去世的姐姐。

其实在“我”10岁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星期天的晚上，母亲和一个年轻女人在小路上闲聊，而“我”就在旁边玩耍。“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警觉起来的，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我开始听她说话，听着听着好像都喘不过气来了。”母亲告诉女人，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叫吉内特，在6岁时死于白喉。母亲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悦 记者 蒋肖斌

1988年6月23日，儒学大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已经过去35年。今年11月12日，为纪念梁漱溟先生130周年诞辰，“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三讲“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在北京大学开讲。

梁漱溟是世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学开山者，他一生都在中西文化比较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新绽放光彩的机会。他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由“人世”到“出世”，再由“出世”到“人世”的变化。

可以说，梁漱溟毕生都在试图破解的思想谜题，其中一个“是中国问题”，另一个是“人生问题”。

## 将趋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少年时期的梁漱溟，曾是功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以利害得失说明是非善恶”，他曾把去苦向乐、趋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梁漱溟早期的人生观念，主要是受其父亲梁济影响。梁济以“有用处”三个字来评价世间一切事，认为有用即是好，无用即是不好。

梁济曾为清朝举人，但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最看不起读书人。梁济在家中说：“会做文章的人，就是会说假话的人。是诗词赋以假八股和古文等等，其中多是装饰门面的假话，全无实用。”他时常叹息痛恨中国事情为文人所误。

不过，梁漱溟慢慢发现，这种对人心的粗浅看法，存在很多疑问。功利主义中，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这种看法，最终被他否定了。

18岁时，梁漱溟不顾家人反对，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他毅然剪去发髻，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并做了同盟会的喉舌《民国报》的外勤记者。但不



▲《县乡的孩子们》书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迫调整家庭发展规划。于是，“陪读妈妈”会普遍出现，家庭会花高昂的费用送子女去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支出也会成为家庭的刚性支出项目。教育投入会成为县乡家庭最主要的投入，挤压县乡家庭的经济积累，降低家庭抵御发展风险的能力。

不仅如此，家庭团结与韧性也会受到重大冲击。年轻妈妈返乡陪读，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夫妻关系会受到影响。据陪读妈妈们讲，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超过两年，很容易引发夫妻情感危机，严重者会产生家庭危机。为了节省开支，陪读家庭租的房子基本都是只有一个卧室，这就意味着陪读妈妈和孩子长期共处一室，空间的紧张反而会导致愈发紧

张的亲子关系。

陪读妈妈因为承担着家庭的教育重担，并生活在天天面对其他陪读家长的环境中，会产生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法克服的教育焦虑，也会因此对孩子成绩波动十分敏感。当陪读妈妈将这种教育焦虑和对成绩的重视传导到孩子那里时，孩子会感到自己处于十分压抑的家庭氛围中，甚至会主动减少或者拒绝与妈妈沟通学习问题和内心所想。

由于妻子返乡陪读，在外务工的丈夫独自一人承担着家庭经济的重担，面临的劳动压力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重压之下，家庭就会减少向老人输送的养老资源，甚至还需要耄耋之年的老人持续向子

代进行资源支持，如老人的劳动力资源、经济积累等。在这种结构下，没有能力输入资源的老人会被子代和自己认为“无用”。老人的价值被物化，家庭面临着伦理危机与潜藏的养老危机。

## 县乡孩子们与整体性社会流动

县乡家庭期待的向上流动，是参照自身起点来评价的。不是在一线城市年薪百万、有车有房，而是在县城或者地级市有收入不错且稳定的工作，并能体面安居。只要子女能够渐进地实现向上流动，家庭就认为能够满足期待。

因此，县乡家庭期待的县乡教育，不

安妮·埃尔诺《另一个女孩》：

# 揭开内心的“朦胧地带”

吉内特像一个仙女，比“我”更可爱。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父母的口中听到关于吉内特的故事。“我”装作没听到这件事，继续玩闹，正如在日后的每一天一样。然而，“母亲的话像一团没有声音也不热的火，瞬间影响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活”。“我”的幸福戛然而止。

就像书中所写，“我生活在你的缺席中”“死了的你进入了活着的我的生活”。在胡小跃看来，姐姐对“我”的伤害是明摆着的：由于她，父母没有全心全意地爱“我”，而是分了一大部分爱给她，甚至爱她超过爱“我”。姐姐是父母之间的纽带，不管他们如何争执，只要说到死亡，他们便会和解。“我”知道，父母想说的其实是姐姐。姐姐也是他们伤心、惋惜和追忆的对象，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

“我”因此感到失落、宠宠，“我”对姐姐的妒忌是正常的。”胡小跃说，但是“我”也明白，姐姐是无辜的，错的是父母，他们不该以这种方式让“我”知道这个秘密，也不该偏心，作那种比较。所以“我”怨恨的是父母，而不是姐姐。

“我”一直否认姐姐的存在，不想了解她的任何细节。然而，看似没有交集的姐妹俩，却成长在同样的空间与环境中。例如，“我”睡的是她的小床，用的是她的书包，跟她有着同样的亲人。“我”一辈子也走不出她的阴影。”胡小跃表示，这种无奈、嫉妒和怨恨，也伴随着某种愧疚和罪恶感。由于家中的经济条件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所以在“我”看来，没有姐姐的姐就没有“我”的活。“我”甚至有点害怕姐姐会指责“我”取代了她，夺走了父母对她的爱，夺走了她的生命和本来应该属于她的幸福。”胡小跃说。

原本这只是作者深藏于心的“朦胧地带”。2010年，某个出版社组织了一个活动，请作者们给陌生人写一封信。这给了埃尔诺一个机会，让她放下下定决心，去触碰禁忌。这封信便是这本《另一个女孩》。

胡小跃觉得，埃尔诺的作品是平和的，没有什么突然的、震撼的东西，但她很直率，不伪装，敢揭自己的短。“她把你当作一个真正的朋友，告诉你她家中的秘密、不幸甚至丑事。”他说，这样的作

家不多，这也是埃尔诺吸引人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朦胧地带’或隐私，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有权保留给自己，不与外人分享，但这也可能带来误会、不解和矛盾。”胡小跃认为，是否公开，何时公开，要因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有的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很难沟通和交流，并且许多秘密随着时间和年龄的推移会不再是秘密。但如果保密不严而又不坦诚公开，则很容易引起孩子的猜测和误会，甚至造成伤害。”

和埃尔诺的很多作品相似，《另一个女孩》依旧保持着“平淡写作”的风格，不夸张，带有自传或“自撰”的色彩，故事背景、情节和许多人物在她的其他作品中曾多次出现。

胡小跃表示，翻译埃尔诺的作品，只要保持平静的心情，慢慢听她说就可以了。不过，由于她的作品之间有很多关联，翻译时需要阅读埃尔诺的很多作品，了解生平，否则可能会读不懂。

埃尔诺“简洁”的写作方式也为翻译工作提出了挑战。“句子越简约，省略或

隐含的信息可能越多，误会也许就会随之而来。”因此，胡小跃在翻译时不仅要剖析作者的文字、结构和语法，还需揣摩作者的创作心理、查阅背景资料、研究作者的行文习惯，加上合理的推测和想象。“同时，文字越简单，译者二度创作的余地越有限。但如果还原不出‘简单’背后的复杂与丰富，文字就会寡淡如水。”胡小跃说。

书名其实有两种选择：《另一个女孩》和《另一个女儿》。在法语中，“女孩”和“女儿”是同一个单词“fille”。“fille”虽然指的是“我”的姐姐，但作者并未从父母的角度来写这个女孩，而是以平视的，甚至是陌生、疏离的角度讲述她的故事。胡小跃说，长久以来，“我”不愿意承认她的存在，并且作者更乐意用“女人”“男人”这种中性的词来指代父母。加上“fille”在书中的混用，尤其是父亲还曾口误，用这个词来称呼外孙女。因此，胡小跃认为，这里译成“女孩”更合适，也与作者其他作品的书名译名更协调。

会城市，县乡教育生态会被破坏。

二是建构良好的家校关系，家校之间相互信任、协力合作，学校不应把教育责任推给家长，家长也要放心让老师管孩子。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要给中小学教师减负，让老师能够集时间和精力在教育教学上。县乡的孩子主要来自农民家庭和城镇双职工家庭，家长缺乏进行文化教育的能力或者时间，县乡学校需要多承担一些教育责任，在县城范围内合理布局寄宿制学校。相关部门要敢于承担责任，引导家校之间形成可以沟通和相互信任的关系。

## 县乡孩子们与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发现，县乡家庭和县乡的孩子们非常依赖我们国家所建立的公立教育体制。如果县上的公立教育办得好，县乡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可以比较低，县乡的孩子们仍然能够实现教育成功，有源源不断的机会去追求向上的阶层流动。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在县乡的大量教育投入取得良好预期效果，更是坚定地证明着我们社会主义公立教育体制在培养人才上是高效率的，并凸显出该教育体制具有弥合阶层差距的作用。

办好县乡教育，给予县乡孩子们教育流动的机会，也是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这些县乡的孩子们对家乡有感情，有发自内心的回馈家乡、发展家乡的热情。

外出闯荡的县乡学子是县域发展的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本，留在家乡发展的县乡学子则是县乡发展的主力军，是推动本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后继力量，是中西部县域推动工业发展、承接东部地区和城市产业转移、加入产业升级队伍的人才基础，是东部县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

笔者与团队近期出版了《县乡的孩子们》一书，对县乡教育有系统全面的论述，对于以上问题都有观察和分析。我们希望通过集体的努力，一起解决县乡孩子们面临的教育困境，为县乡孩子们的成长添砖加瓦。

（作者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县乡的孩子们》作者之一）

类似含混性的词句在书中多次出现。“这是因为作者没有把你当外人，以为你知道她的一切，认为你懂。”胡小跃解释，这种懂不单单建立在词语之上，你还要了解她的身世、背景和其他作品。

在胡小跃看来，有的作品能给读者以知识或启发，而有一种文学是用来感受的，埃尔诺的作品便属于后者。“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秘密。”虽然埃尔诺写得多是自己身边的小事、家事，没有太震撼人心的内容，但是“生活本身就是平淡的，对你来说是轰轰烈烈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未必如此”。胡小跃觉得，真诚、自然比什么都重要。



《另一个女孩》书封 北京联合天畅出版公司供图

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新方向。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家”身份大为褪色。十年乡村建设活动和十年“奔走国事”，使他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行动的儒者”，对终极性的思考也淹没在喧嚣的尘俗和杂乱的奔忙之中。不过，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梁漱溟在亲历人生况味后，不得不重新思考世间的意义。

“文革”期间，梁漱溟长期处于与世界隔绝的隐遁状态，越来越远离了所追求的世间的中心。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落入淡泊和寂寥，世间的意义和现实的价值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小。他意外地向世人宣称，“其实我一直持出世的思想”，将思想的指针又重新指向了出世。

梁漱溟晚年创作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代表作，明显地又接上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主题。他重提了人生三大问题之说，这话是旧闻，但意义确已不同。他说：“人对自己问题的学术，是打通世间出世间的学问，即是彻究乎宇宙生命的学问”。

此时，梁漱溟更多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性和文化的终极意义来谈论这个问题。在《人心与人生》的结尾处，梁漱溟得出了以下结论：“世间法者，生灭法也；生灭不已，不由自主。”就根本而言，他对出世思想做出了最高价值的认可。

纵观梁漱溟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复杂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内心深处始终坚持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思考。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把握更多表现为条陈之时，当世间意义的把握更多表现为有目标的、自觉的行动之中；而当面对社会显得无力无奈之时，如何来说明世间的意义，便成为他的主要关切。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落下，享年95岁。

（根据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三讲——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写作）

# 梁漱溟：儒学大家如何看待人生

久，1912年，作为记者的梁漱溟对现实的态度开始变得灰冷起来。他看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黑暗政治内幕，对民国初年的政坛感到极度失望。

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年轻的梁漱溟对人生的意外产生了彻底怀疑，甚至两次想过自杀。1914年，他在写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说道：“所谓年来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矣！所谓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儒而已矣！”

梁漱溟哀叹人生的无目的，认为世俗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都是有限的、相对的，并没有恒定的意义，所以通透的人生观只能取出世。

在困扰中，他完成了《究元决疑论》的撰写。可以说，这篇最能代表梁漱溟出世思想的文章，是他四五年来研读西方哲学对人生所作思考的一次小结。

##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也正是因为《究元决疑论》的发表，1917年10月，年仅24岁的梁漱溟受蔡元培邀请，正式来到北大授课。梁漱溟晚年回忆：“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人。而今我己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但彼时，梁漱溟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我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蔡元培犹豫了一阵才回答。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



梁漱溟与北京大学同事在北京中山公园，左起为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 中国文化书院供图

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的梁漱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心安，更是决心人世解救世道人心。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父亲的去世，是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加速器。

1918年11月7日，父亲梁济问他，“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老人说完便离开家门。3天后，梁济穿戴整齐在积水潭投湖自尽。

事实上，这个回答对梁济来说，只是一种绝望。在梁济的世界中，他只能

看到西方的强势文化，认为中国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旧观，生活只是苟且偷生，不具任何意义。但梁漱溟与父亲不一样的观念，他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既可以发挥西洋的未来精神，也可以挖掘中国文化的潜力。

在现实环境的刺激和催逼下，梁漱溟愈发从出世意念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位使命感极强的人物。他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